

燕

编著 / 穆 青

赵

定瓷艺术



定窑的故乡——曲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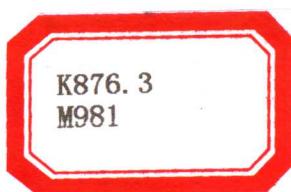
揭开定窑神秘的面纱

定窑的时代风格及艺术特色

定窑瓷器的铭文

河北教育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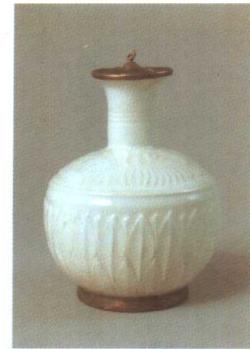
郑州大学 *04010091983Z*

—4

燕 赵 文 化 系 列

定 瓷 艺 术

穆 青 编著



K876.3
M981

河 北 教 育 出 版 社

Qat31/04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定瓷艺术/穆青编著.一石家庄: 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2.10

(燕赵文化系列)

ISBN 7-5434-4830-0

I. 定… II. 穆… III. 定窑 - 瓷器(考古) - 河北省 IV.
K876.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2) 第029889号

燕赵文化系列

定瓷艺术

策 划 张志欣

编 著 穆 青

责任编辑 孟保青 张天漫

特约审读 张圣洁

装帧设计 郑子杰

出版发行 河北教育出版社

(石家庄市友谊北大街330号)

制 版 时尚兴裕制版有限公司

印 刷 深圳 (宝安) 新兴印刷厂

开 本 889 x 1194 1/16

印 张 12

印 数 2000册

出版日期 2002年10月第1版 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7-5434-4830-0/K.217

定 价 118元(平) 128元(精)

总序

传统文化是人类文明的源头。一个民族的早期生存状况，是孕育其民族文化的温床。燕赵文化肇始于远古时代，形成于春秋战国之际。先秦时期中国文化已形成黄河流域的燕赵文化、齐鲁文化、中原文化、秦陇文化和长江流域的巴蜀文化、荆楚文化、吴越文化。它们在中华文明形成的过程中互融互补，相互吸纳和影响，相互启迪和发展，无可替代又不可或缺地形成了泱泱华夏民族文化之母体，以各自绰约的丰姿和天赋神韵共铸了中华传统文化的实体。作为北方文化中心的燕赵文化，凭着中原与草原交接点的优势，吸纳了中原文化和草原文化的精华，带着自身固有的优秀和特质，既有中原文化的人伦秩序、天人和谐的中庸之道，又有草原文化洒脱于俗儒礼法之外的浪漫心态和纵横风格，形成了燕赵文化“慷慨悲歌”的人格风范，随着时序的演进而不断完善和臻于完美。

河北是燕赵文化的首善之地，又是古代中原的光被之区。优越的地理条件和天赋的生存环境，使她无愧于巍巍华夏文明之摇篮，泱泱民族文化之大渎。从泥河湾旧石器文化发展序列的建立到揭开黄河流域早期新石器文化探索序幕的磁山文化的确立，从承德兴隆四方洞旧石器洞穴遗址的发现到徐水南庄头有陶新石器遗存的发现，从邢台先商遗址群的发掘到藁城台西商代聚落遗址的发掘，成功地揭示了河北远古时代先民们的生活足迹和生存方式，揭示了他们为摆脱茹毛饮血的蛮野生活而步入文明时代的漫长而艰辛的步伐和他们所创造的水准相当高的原始文明，涵盖了从原始社会末期到奴隶制王朝生成的那段浸透着血与火的“有虞”



邯郸武灵丛台(战国)

秉钺，如火烈烈”的历史进程。从此种意义而论，它们又是中国古代文明肇始的源头。

战争是血写的文化，人类文明的伴娘；与战争俱来的是人类文明的生成、创业和创造历史的宏远钟声。从传说中的黄帝和炎帝在阪泉(今河北涿鹿县东南)摆下生死战场，便掀开了炎黄子孙逐鹿中原、轰轰烈烈、气壮山河的战争史篇：商汤灭桀，武王伐纣，诸侯弱周，战国纷争，秦兼六国，楚汉相争，三国鼎立，魏武称雄，隋唐崛起，宋辽对峙，乃至燕王扫北定都燕京，历史在这里留下了血与火的沉重脚步。

河北自古又是民族大融合之地，为泱泱汉族的形成、巍巍华夏的建构，不断输入新的血液。从传说中的炎黄联盟在涿鹿之野诛共工而纳其部族，扬其长而裨已短，历史在这里又掀开了民族大融合的伟大序幕：从戎狄窥周，胡马犯汉，羯氐南进，鲜卑立国，燕云割让，辽、金建都，乃至元、清问鼎，京国北京，入主者的剽悍雄风，异域文化的别样风采，与中原文化的“阴阳合德”、中庸仁爱的儒学风骨，构成了燕赵文化孝、悌、忠、信、礼、义、廉、耻的拯世补敝的圣人情结和慷慨悲壮、阳刚健美、大气恢宏、典雅雄浑的审美特征。

世代生存繁衍在这块土地上的先民们，在战争与和平、流徙与安定、灾祸与康宁、痛苦与欢乐中，以他们无尚的勤劳和智慧、无限的梦想和憧憬以及坚忍不拔、相继相踵的千百代的艰辛劳动，播下了无与伦比的古代文明。燕赵华都，中山建国，邺城三台，离宫苑囿，皇家陵寝以及豪华壮丽的外八庙……为后代留下了万世瞻仰和凭借的建筑典章。甘棠听讼，胡服骑射，桃园结义，魏武挥鞭，陈桥兵变，永乐治典，康熙平“三藩”、勘定中俄边界，乾隆绥靖边境、优恤土尔扈特……雄才霸主，睿

智君王，在这里留下了治国安邦的宏图和伟业。程婴救孤，乐毅击齐，完璧归赵，将相好合；董仲舒祖述《春秋》，以“贤良对策”开“独尊儒术”之基业；魏徵犯颜陈二百余事，以“三镜”谏太宗；宋璟革除积弊辅玄宗；赵南星陈时政四大害……度世谋臣、宏才将相在这里献芹策以安邦，出奇谋以辅国，留下了万世景仰的业绩、纬地经天的篇章。魏武碣石留诗篇，陈思三台赋华章；郦道元为《水经》作注，留下了旷世奇章；杨衒之撰《洛阳伽蓝记》，称古今佛都第一书；卢思道一曲《听鸣蝉篇》，开初唐七言歌行之先声；高适大器晚成，边塞诗中负盛名；李昉尚易晓而文浅近，宋四大类书(《太平御览》、《太平广记》、《文苑英华》、《册府元龟》)中显奇才；关汉卿的《窦娥冤》，尚仲贤的《柳毅传书》，马中锡的《中山狼传》，以文警世；清代第一才子纪晓岚以《阅微》测鬼神，曹雪芹十年辛苦著《红楼》……显晦学人、旷世英才为后世留下了盖世华章和深富哲理的锦绣文章。更有历代的赫赫哲匠、默默艺师，在这里展才华而竭殚思，留意匠而神飞扬，为后世留下了绝世之杰作与足以使鬼泣神惊的旷世崇构和超凡技艺：这里有气势恢宏、建构精美、艺术超群的皇家宫阙；有集南北园林艺术之大成、构思奇巧的皇家苑囿；规模庞大、含蕴深沉、庄严肃穆的皇家陵寝；天人同构的宗教寺庙；小家碧玉、幽雅脱俗的私家园林；金碧辉煌的楼阁殿宇；千姿百态的亭台塔榭……它们含蓄的内蕴、鲜明的时代特色、博大的气势、巧妙的因藉和得体的组合，无不展现着深厚的民族风彩、高雅的人文气韵，让人叹为观止。凡

承德避暑山庄金山亭(清)



此种种，林林总总地壮美着燕赵文化之魂，交融着燕赵文化之神，丰富与辉煌着燕赵文化的气韵和底蕴。以至信手拈来任何片段，随手启封几件尘封的故物，皆可唤醒一段历史的记忆，也足以构成一篇杰出的历史华章。甚至不必刻意张扬，也不假良辞妙语之功，那绵绵的情思、熠熠的哲理、深邃的理念和辽阔的人文天地，都足以构成动人心弦的历史人物故事而自成锦绣之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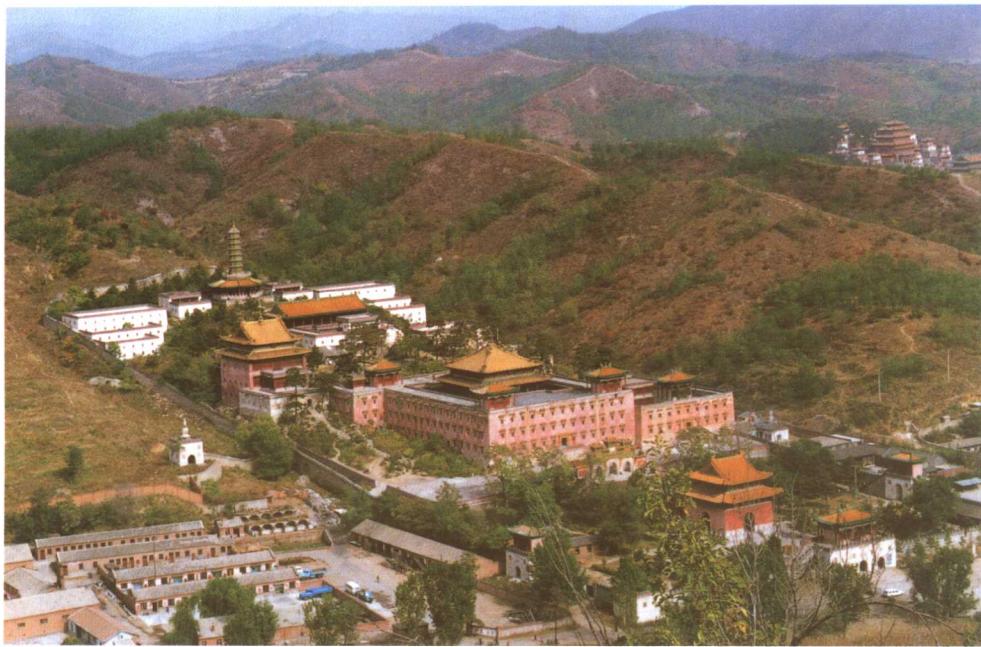
传统是一个动态的、多元的、涵盖面极广的历史范畴。历史是过去的现实，优秀的传统是已逝的辉煌。即便是古代现实生活中普遍需要而存在的一切，如今却只能在以艺术为目的的传统文化之宫中攀蟾折桂，只能用热烈的感应神话般的灵心善感之虔诚，来领受它的超越力量。对历史的一个体验、一份感知的细微信息，在现代化的追求和丰富的理性认知中，都可能放大为内心生活或观念情操上的电闪雷鸣。如何在失却了养育这种精华的社会土壤的现代，发扬传统的独特精华，使现代化承受传统的富饶，对传统本根的沟通意识，就成了我们适应时代潮流能力的基础。空间上的社会性认同和时间上的承传性定势，扭结为富于弹性的网罗，疏而不漏地笼罩着所有冲决性的努力。因此，我们必须刊落那些为思维定势所遮蔽的盲点、为历史情结所僵固的陋

习，充分发挥源于人类心理深层的灵性动力，深厉浅揭，达其根本，将对传统文化的习惯性、直观实录性感悟，转换为理性的、历史性的时空分析和人文精神研究，张扬与重构符合当时地域环境的特定的历史标准和文化标准，从中寻绎到地域文化对传统文化合而不同、整而不统的个性特质。因为正是地域文化的这种群而各异的特质，造就了民族文化丰富多彩的特质（参见卢辅圣《远去的传统——中国书画全书序》，《美术史论》1994年第1期）。

然而，传统毕竟是我们赖以生成的基础。作为历史性、民族性的生存方式和思想结晶，它仍然影响着我们的行为取向和知识体系。任何一种民族文化都不可能离开既有的传统而独立存在；任何一种民族文化的更新，都是对既有传统的有机结合。传统文化不仅作为绵延无尽的价值渊薮，滋养着不同需求的个人，同时还



赵州陀罗尼经幢(宋)



承德须弥福寿之庙(清)

通过群体记忆的途径，不断解构与重扬、离异与回归，影响着人们的集体行为取向。现实要求我们对正在远去的传统文化作出揭示其历史真姿的努力。建立一个全面反映河北传统文化同时又便利于现代人理解、欣赏、认知的知识文库，是我们责无旁贷的使命。把握历史的机遇，通过对历史过去性和现存性的辩证理解、历史意识与即时意识的有机融合，通过对传统文化与地域文化的历史感悟，达到更深广、更翔实、更本质的追求，这需要有深沉的历史眼光、纬地经天的气魄、探幽发微的智慧、集涓汇流的才情，以宏阔的手笔、高远的胆识、超凡的努力，从繁縟浩瀚的历史事物中梳理出各个方位、各种层面的代表实例，使之成为连贯的文化序列；又要用缜密周详的梳理功夫，钩沉辑佚，探赜译秘，从浩如烟海的旁邻典籍中搜求与其相涉相关的文献资料，使之有效地集合，在保持历史真实的前提下，纳入河北传统文化中，形成一个相对完整的、系统的、学术的、地域的同时又是民族的传统文化的辉煌坐标。这里有历代信仰的启示、人文气象的观念，更有深符的科学原理。这是民族传统文化心理的传承，又是传统文化人格风范的飞扬。以传统文化为底蕴，以现代视觉为准绳，熔裁出古今人文景观合璧的大制作、大手笔，熔铸我们对传统文化的真诚心思和深切感悟，让人们在赏心悦目中领略传统文化的神韵；在世界性的文化交流及所谓的“文化冲突”的威胁声中，用心血铸就燕赵精神文明重新辉煌的史册。在科技腾飞和信息时代、“地球村”到来的新世纪，筑就我们新的精神家园，开拓一个精微深邃、更高层次的理论思维的堂庑，是我们华夏学人的不懈追求和美好愿望。以我

们的才情和学识，虽然却步于体大而虑周的专门著述，也弗敢涉足总结历史经验的百年反思，然而从细微处入手，在历史的宝库中撷英集奇，选萃辑珍，抽其芬芳，振其金石，作一个今与古、流与源、前景与背景的有效介绍；从历史的不同断面，寻找那曾经生机盎然已熔铸于永恒的传统文化的精华，用人文主义的理念和理性思考去阐发传统艺术的伟大精神基调，这毋庸置疑地同样是伟大而艰巨的使命，需要我们以虔诚而缜密的心思，小心翼翼又忠厚笃实地去把握历史的真实，体悟传统的真谛。在积淀历史经验、吸纳考古学成果、融会古今文献的基础上，从一个全新的角度去探索和研究燕赵文化的丰富内涵，明允笃诚地辨析疏通，“列图史以考玩，殚元思于今昔”（明·何景明：《待曙楼赋》），观物会理，绘事穷经，以一种新的观念和灵感，在发现和创造中见奇伟，捕捉瞬间流动却震撼灵魂的伟大生命的光彩。

正是基于此种务实又力所能及的目的，我们选择了几个历史的断面，摘取了燕赵文化殿堂的只砖片瓦，以期通过我们的管窥蠡测，使读者领略燕赵文化的悠远浩瀚和瑰丽多姿。燕赵文化是内蕴非常丰厚、涵盖极为宏富的多元复合体，几个视点当然不能见其全貌，探赜也未必能够致远；但是，我们可以通过几个断面的研究和解读，尽我们的努力去理解和诠释他们的时空内容，以虔诚之心去体察和破译他们的文化内涵，在那不可见之处，发现他们所隐含的伟大而诱人的信念，扬风托雅，鉴民族之雄心，而推燕赵之纯情。当我们跨入新世纪门槛之际，回望已经离去的历史，深深反思自己的文化，以雅俗共赏的形式，营造一个读赏结合的园地，驰骋才思和想像的场所，提供一个认识理解与领悟把握传统文化的良机，捧出我们心灵深处的感动，借以增加信心，坚定步伐，踌躇满志地迎接未来世纪的全新事业，是历史赋予我们的使命和职责。

为了奉出易于被大众理解和接受的通俗化读物，我们跨越了对文物资料甄引的旧式藩篱，化高雅为通俗，变深奥为浅显，扬弃了繁缛的考证，简捷率直又直道底里地吸纳各种研究成果，博采众长，广集高论，述专家之元意，整诸家之不齐，以平凡献学术，经过缜密的遴选和割爱，推出了这套丛书。虽然难免因韫椟藏珠而遗珍，但我们始终是以揭示燕赵文化之历史丰姿、弘扬民族文化之博大为初衷，寻绎出地域文化与民族文化的血肉联系和魂魄相通。真诚地企盼能不辱斯命，于愿足矣。

张志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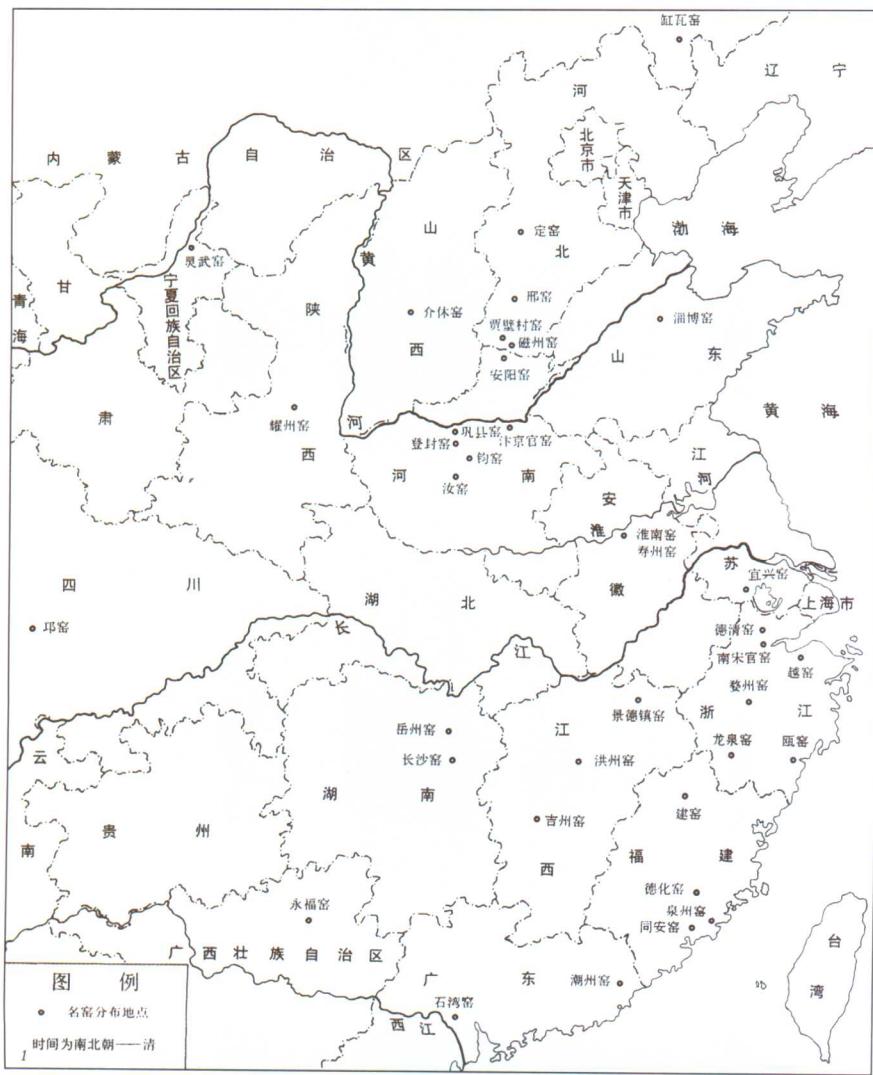
目 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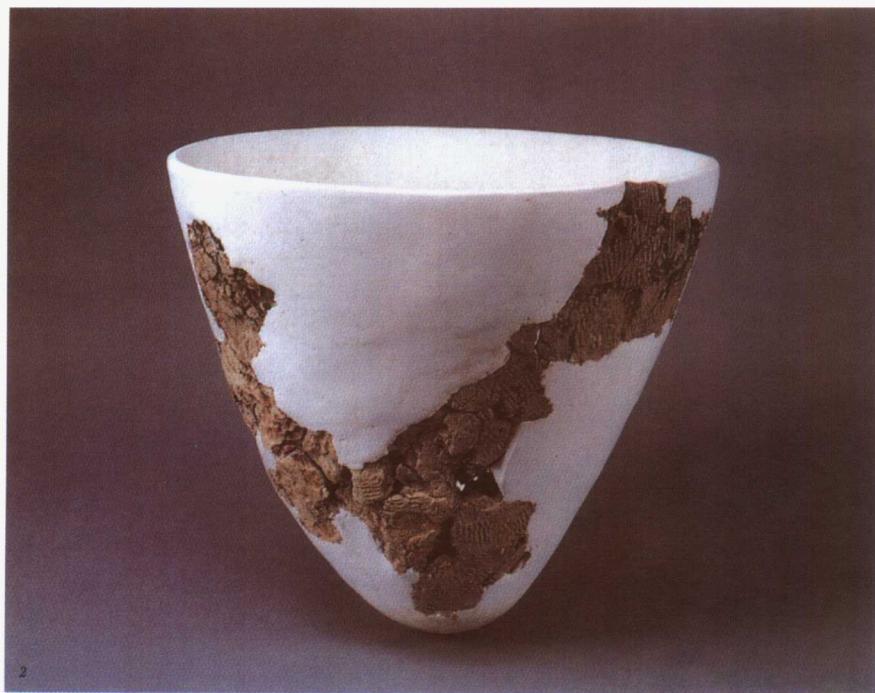
| | |
|----------------|-----|
| 引 言 | 1 |
| 一 定窑的故乡——曲阳 | 12 |
| 二 揭开定窑神秘的面纱 | 28 |
| 三 定窑的考古调查与发掘 | 30 |
| 四 定窑的历史分期 | 36 |
| 五 定窑的时代风格及艺术特色 | 38 |
| 六 有关定瓷几个品种的再认识 | 148 |
| 七 定窑瓷器的铭文 | 164 |
| 小资料 | 175 |

引言

瓷器是中国古代最为重大的发明之一，它与我国著名的“四大发明”(造纸、火药、指南针、活字印刷)一样，为促进世界文明的进步与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CHINA”在英语词汇中既代表“中国”又可译作“瓷器”，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讲，可以说瓷器是中国文明的象征。(图1)



1-中国古代名窑分布图



2-灰陶釜

新石器时代早期。口径 31.0 厘米。

1995 年湖南道县寿雁镇白石寨村玉蟾岩出土。

3-灰陶平底孟、靴状支架

新石器时代·磁山文化。孟高 12.0 厘米，口径 14.0 厘米；支架高 15.0 厘米。

1973 年河北武安县磁山文化遗址出土。河北省文物研究所藏。

4-几何纹彩陶豆(下页图)

新石器时代·大汶口文化。高 28.4 厘米，口径 26.0 厘米。

1974 年山东泰安大汶口出土。山东省考古研究所藏。



注释：

(1) 江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江西万年大源仙人洞洞穴遗址试掘》，《考古学报》，1963年第1期。

(2) 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队：《桂林甑皮岩遗址的试掘》，《考古》，1976年第3期。

(3) 袁家荣：《玉蟾岩获水稻起源重大物证》，《中国文物报》，1996年3月3日。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烧制陶瓷器皿的国家。早在新石器时代初期，居住在洞穴中的远古先民通过长期劳动实践以及聚居生活的需要，已经学会了用陶土烧制简单的陶器。根据考古发掘和科学测试，距今大约一万年至九千年的江西万年县大源仙人洞遗址⁽¹⁾、广西桂林甑皮岩遗址⁽²⁾以及湖南道县玉蟾岩遗址⁽³⁾出土的陶片(图2)，是目前所知最早的陶器。这些早期人类遗址出土的陶器造型简单，胎体粗糙疏松，胎壁凹凸不平，带有明显的原始性。“仙人洞遗址出土陶器表明，中国是陶器制作的故乡，因为它比目前世界上最早的陶器——西亚穆勒拜特遗址出土

的四件低温陶器要早五个世纪。”⁽¹⁾ 陶器的发明大大推进了人类文明的发展进程，“在此之前，人类制造石器、骨器、木器等等，都只是改变了自然物的形态，而没有改变它们的本质。然而，用粘土烧制陶器，不但改变了自然物的形态，而且也改变了它们的本质。”⁽²⁾ 正如恩格斯所言，人类野蛮时代的低级阶段，“从学会制陶术开始”。⁽³⁾ 陶器的出现极大地改善了人类的生存条件，成为当时生活、生产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物品。因此，制陶业在整个新石器时代一直极受重视。

经过两千余年的发展，陶器制作逐渐由低级阶段向高级阶段过渡，在距今七八千年的裴李岗文化⁽⁴⁾ 和磁山文化⁽⁵⁾ 遗址中，陶器已成为出土文物中数量最多且最能体现其物质文化水平的物品。河南新郑裴李岗出土的陶器与早期相比，器物品种及质量都有明显提高，出现了碗、钵、壶、罐等用途不同的器皿，器物多为素面，少数装饰有划纹、篦点纹、指甲纹和乳钉纹等。河北武安磁山出土的陶器更加丰富，除了碗、钵、壶、罐外，还有盘、豆、孟、四足鼎以及靴状支架等，其中组成炊具的直壁大平底孟和倒靴状支架为磁山文化特有的代表性器物(图3)。磁山文化陶器的装饰亦较简单，纹饰主要有划纹、篦点纹、指甲纹、绳纹、乳钉纹和席纹等。随着制陶技术的成熟与发展，陶器的品种、造型和装饰日趋丰富，不同地域、不同时间、不同族属所烧制的陶器都具有各自的风格特点。因此，在考古工作中考古学家总是把陶器作为衡量文化性质和分期断代的重要依据。例如黄河流域仰韶文化⁽⁶⁾ 是以精美的彩陶为代表，彩陶纹饰主要以花卉、动物以及

注释：

(1) 熊寥：《中国陶瓷美术史》，紫禁城出版社，1993

年8月版。

(2) 同(1)。

(3)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1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5月版。

(4) 裴李岗文化：华北早期新石器文化。1977年首次发现于河南新郑县裴李岗，主要分布在豫中一带。据碳十四测定其年代约为公元前5600~前4900年。裴李岗文化的经济以农业为主，制陶业已经具有一定规模。陶器以泥质红陶为主，夹砂红陶次之。手制成型，主要采用泥条盘筑法，烧成温度约900℃~1000℃。

(5) 磁山文化：华北早期新石器文化。1976年发现于河北武安县磁山。主要分布在河北省中南部。据碳十四测定其年代约为公元前5400~前5100年。磁山文化的经济以农业为主，在发掘的八十多个窖穴中，发现了大量腐朽粮食的堆积，最厚的达两米以上。陶器以夹砂红陶为主，泥质红陶数量不多。陶瓷采用泥条盘筑法和捏塑法成型，烧成温度约为700℃~930℃。

(6) 仰韶文化：黄河中游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文化。1921年瑞士学者安特生首次在河南渑池仰韶村发现仰韶文化遗址。其分布以渭、汾、洛等黄河支流汇集的中原地区为中心，目前发现的遗址已有一千余处，是新石器文化中的一支主干。由于这些遗址中都出土有一定数量的彩陶，故又被称做“彩陶文化”。据碳十四测定，其时代约为公元前5000~前3000年。仰韶文化是一种比较发达的定居农耕文化遗存，主要农作物为粟和黍。最能代表其手工艺水平的是发达的制陶术。仰韶文化陶器仍处于手制阶段，但造型规整，火候也掌握较好，品种以泥质红陶和夹砂红陶为主。泥质红陶上常用黑、棕、红等色彩绘几何图案或动、植物花纹，这是当时最有成就的一种原始艺术。



注释:

- (1) 龙山文化: 黄河中下游地区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1928年首次发现于山东章丘龙山镇的城子崖。主要分布在山东中、东部以及江苏的淮北地区。据碳十四测定, 时代约为公元前2800~前2300年。山东龙山文化以农业为主, 手工业发达, 尤以制陶和制玉最为突出。山东龙山文化陶器普遍采用轮制法成型, 器型相当规整, 器壁的厚薄也十分均匀。各类陶器中以黑陶最具特色, 其中晚期遗址出土的蛋壳黑陶高柄杯, 器壁最薄处仅厚0.3毫米, 制作工艺达到了古代制陶史上的顶峰。
- (2) 河姆渡文化: 长江中下游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文化。1976年首次发现于浙江余姚县河姆渡。主要分布在杭州湾南岸的宁波(绍兴)平原, 并越海东达舟山岛。据碳十四测定, 年代约为公元前5000~前3300年。河姆渡遗址出土了大量腐朽的稻谷, 有些地方稻谷、稻壳、茎叶等交互混杂, 形成0.2~0.5米厚的堆积层, 最厚处超过1米。河姆渡文化陶器以夹炭黑陶最富特点, 胎内有意羼入碳化的植物茎叶和稻谷壳, 胎质粗厚疏松, 重量较轻, 吸水性强, 烧成温度约为800℃~900℃。
- (3) 良渚文化: 长江中下游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文化。1934年首先发现于浙江吴兴钱山漾, 1936年发掘了具有代表性的良渚遗址。良渚文化主要分布于太湖地区, 据碳十四测定, 年代约为公元前3300~前2200年。良渚文化以农业为主, 遗址中出土的农作物除了稻谷外, 还发现有花生、芝麻、蚕豆等植物种子。手工业以制玉最为发达。陶器中最具特色的是灰胎黑皮陶。陶器成型普遍采用轮制法, 器壁较薄, 胎质较软, 陶衣呈灰黑色, 容易脱落。此外, 遗址中还出土有少量与山东龙山文化相似的薄胎黑陶。
- (4) 中国硅酸盐学会主编:《中国陶瓷史》, 北京, 文物出版社, 1982年9月版。

几何图案为主。根据陶器纹饰的差异以及某些典型器(如小口尖底瓶)器型上的变化, 仰韶文化又可复分为北首岭类型、半坡类型、庙底沟类型、西王村类型等若干不同的类型。此外像黄河下游山东龙山文化⁽¹⁾的蛋壳黑陶、长江流域河姆渡文化⁽²⁾的夹炭黑陶以及良渚文化⁽³⁾的灰胎黑衣陶等, 都带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和地域特征。(图4、5)

在距今约四千年的商代, 陶器大家族中又出现了以高岭土为原料的白陶和胎质坚硬、火度极高的印纹硬陶。白陶在河南龙山文化晚期以及二里头文化早期遗址中已有发现, 到商代后期进入鼎盛时期。河南、河北、山东、山西等地均有出土, 其中以河南安阳殷墟遗址出土的质量最精, 数量最多。殷墟出土的白陶多模仿青铜器礼器的造型, 器表雕刻饕餮纹、夔纹、云雷纹等青铜器上常见的纹饰。这些精美的陶器在当时是专供统治阶层享用的高档工艺美术品, 代表了我国白陶烧制工艺的最高水平。中国陶器经过几千年的发展, 勤劳智慧的先民对陶土的认识越来越清楚, 窑炉结构也变得越来越科学, “大约在公元前16世纪的商代中期, 我国古代劳动人民在烧制白陶器和印纹硬陶器的实践中, 在不断的改进原料选择与处理, 以及提高烧成温度和器表施釉的基础上, 就创造出了原始的瓷器。”⁽⁴⁾(图6、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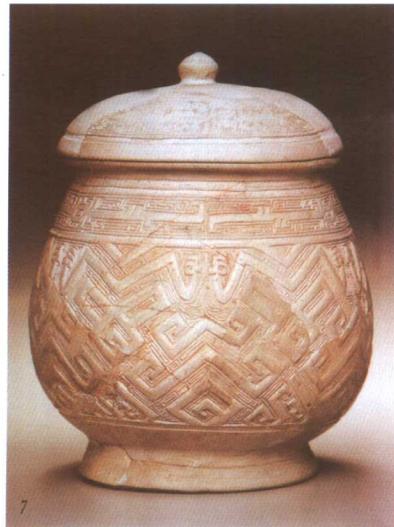
商代原始瓷器的生产工艺基本上与陶器相同, 原料大多未经处理, 胎色以灰白为主, 胎质比较粗糙。器物成型与印纹硬陶一样采用泥条盘筑法, 器型欠规整, 胎壁厚薄不匀。器表施有青灰、青黄、青绿等色的薄釉, 釉层薄厚不匀, 胎釉结合不牢, 常有脱釉现象。这些工艺非常原始的瓷器尽管相当粗糙幼稚, 与真正的瓷器相比有着很大差距, 但它的出现标志着陶器向瓷器过渡的开始。因此, 商代原始瓷器是中国瓷器当之无愧的鼻祖。(图8)

瓷器与陶器虽然在生产工艺上十分相似, 但它们所用的原料却有着本质上的差别。陶器对原料的要求比较宽泛, 大多就地取材, 选用当地的可塑性粘土如红土、河谷沉积土、黑土等。这类原料含有较多的杂质和有机物, 氧化铁的含量也较高, 多在6%以上。瓷器对原料的要求较严, 不但杂质要少, 原料成分中还要





6



7

5—夹炭黑陶方形钵(上页图)

新石器时代·河姆渡文化。高11.7厘米。

1973年浙江余姚市河姆渡镇浪墅桥村出土。

6—白陶豆

商代。高13.0厘米，口径22.5厘米。

河南郑州市出土。中国历史博物馆藏。

7—白陶瓶

商代。高20.0厘米，口径18.5厘米。

陶质洁白细腻，造型及花纹模仿青铜器，工艺极为精细。

河南安阳市出土。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有一定比例的氧化铝、氧化硅以及适量的助熔剂。由于原料不同，二者所需的烧成温度以及物理指标也有很大差异：陶器一般只需 $800^{\circ}\text{C} \sim 1000^{\circ}\text{C}$ 即可；烧成后胎体内玻璃相含量少，胎质疏松，颜色较深；胎体吸水率较高，多在2.5%左右；敲击声音发哑。瓷器则需要 1200°C 以上的高温才能烧结；胎体中玻璃相含量多，胎体坚致细腻，由于含铁量低，胎体颜色较白；吸水率一般在0.5%以下；敲击声音清脆。除此之外，陶器表面无釉，而瓷器则施有一层薄而透明的釉。二者相比，瓷器在美观和实用方面都远远优于陶器，因此一经出现就迅速发展起来。“根据目前公布的材料，我国原始瓷器在黄河中下游地区的河南、河北、山西和长江中下游地区的湖北、湖南、江西、苏南等商代中期遗址和墓葬中都有出土。”⁽¹⁾西周和春秋战国时期，原始瓷器在质量和数量上均有很大提高，“特别是到了春秋战国，原始瓷器的发展已达到了鼎盛时期，其烧制和使用的数量，约占同时期陶瓷器总数一半左右。可见当时原始瓷器手工业已有了很大的发展。”⁽²⁾(图9、10)

经过商周、春秋战国、秦汉近两千年的发展，原始瓷器在原料粉碎加工、器物成型、窑炉结构、烧造工艺等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产品质量不断提高。到了东汉晚期，浙江上虞、宁波、慈溪等地的窑场终于烧出了真正的瓷器，揭开了中国瓷器生产的序幕。

东汉青瓷与原始瓷器相比，胎体坚致细腻，由于窑温的提高，大多数器物能够完全烧结，硬度很高。施釉方法由早期的刷釉法改为浸釉法，釉层均匀光亮，已经达到了瓷器的基本标准。中国科学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曾对上虞县小仙坛东汉晚期窑址出土的一块青瓷标本作过详细的科学测试，测试结果表明：烧成温度已达 $1310 \pm 20^{\circ}\text{C}$ ，胎体基本上完全烧结，显气孔率和吸水率分别为0.62%和0.28%，平均抗弯强度高达710千克/厘米²，这一数值不仅大大超过了浙江德清西周青灰

注释：

(1) 中国硅酸盐学会主编：《中国陶瓷史》，北京，文物出版社，1982年9月版。

(2) 同(1)。

注释:

- (1) 参见李家治《我国瓷器出现时期的研究》,《硅酸盐学报》,1978年第3期。
- (2) 中国硅酸盐学会主编:《中国陶瓷史》,北京,文物出版社,1982年9月版。
- (3) 同(2)。
- (4) 杨泓:《美术考古半世纪》,北京,文物出版社,1997年7月版。

釉原始瓷的抗弯强度(220千克/厘米²),甚至超过了景德镇康熙厚胎五彩花觚的抗弯强度(700千克/厘米²)。由于烧成温度高,胎体瓷化程度好,因此具有较好的透光性,0.8厘米的薄片已可微透光。釉层光亮透明,胎釉结合紧密,无剥釉现象。除了胎体颜色较深外(胎体呈灰白色),其余均符合近代瓷的标准⁽¹⁾。

东汉晚期的瓷器无论器物造型、装饰技法以及烧造工艺,都承续了原始瓷器的风貌,尚未形成自己的艺术风格。但它的出现标志着中国瓷器的诞生。“瓷器的出现,是我国陶瓷发展史上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它给此后的三国、两晋、南北朝瓷业的空前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²⁾(图11)

自东汉晚期上虞、宁波等地烧制出真正的瓷器之后,在浙江境内很快就形成了一个庞大的瓷窑体系,这就是唐代所称“越窑”的前身。越窑“是我国最先形成的窑场,分布地区很广,产品风格一致,也是当时我国瓷器生产的一个主要窑场”。⁽³⁾六朝时期,越窑产品秉承东汉传统,主要烧制青釉瓷,但在器物造型、装饰技法等方面已经摆脱了原始瓷器的影响,出现了全新的面貌。瓷器品种除日常生活用具外,还出现了用于殉葬的谷仓、磨、猪栏、羊圈、鸡笼等明器。器物造型讲究实用与装饰相结合,出现了大量模仿动物形象的器皿,如神兽尊、熊形灯、蛙形水盂、鸡首壶等器型优美、艺术水平极高的优秀作品。在越窑的影响之下,南方制瓷业得以迅速发展。“自本世纪50年代以来,在浙江境内调查出的六朝窑址,遍布浙江省的上虞、宁波、余姚、鄞县、萧山、金华、永嘉、余杭、德清、吴兴、临海、绍兴、丽水、奉化等县市。此外,在江苏宜兴,江西丰城,福建福州、晋江,湖南湘阴,四川成都、邛崃、新津等地,也都发现过两晋至南北朝的青瓷窑址。”⁽⁴⁾(图12、13)

与南方制瓷业兴旺发达、蒸蒸日上的局面相比,北方瓷器此时正处于刚刚起步的阶段。北方瓷器的生产大约始于北魏中后期,主要出土于王室、大官僚等统治者的墓中,出土地点也只限于河北、河南、山西、山东等中原地区。北

8—青釉原始瓷尊

商代。高27.0厘米,口径27.0厘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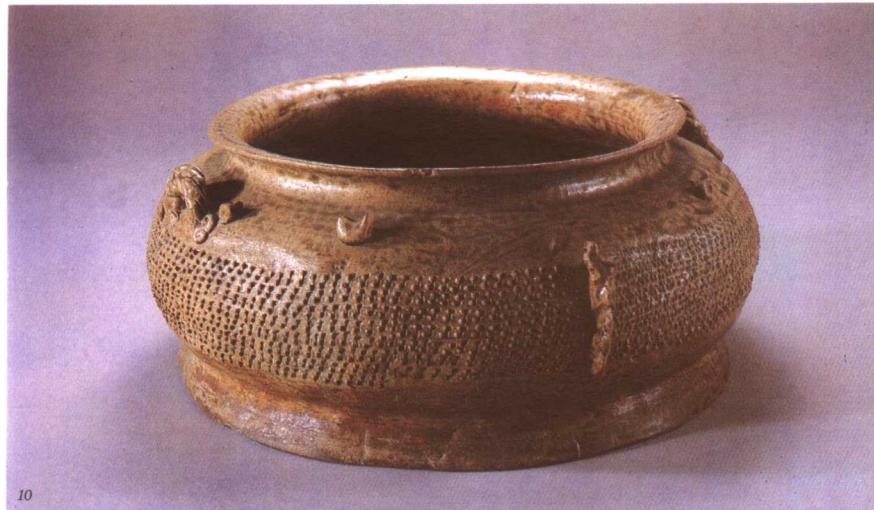
1965年河南郑州市铭功路出土。郑州市博物馆藏。

9—青釉四系原始瓷尊

西周。高24.0厘米,口径14.5厘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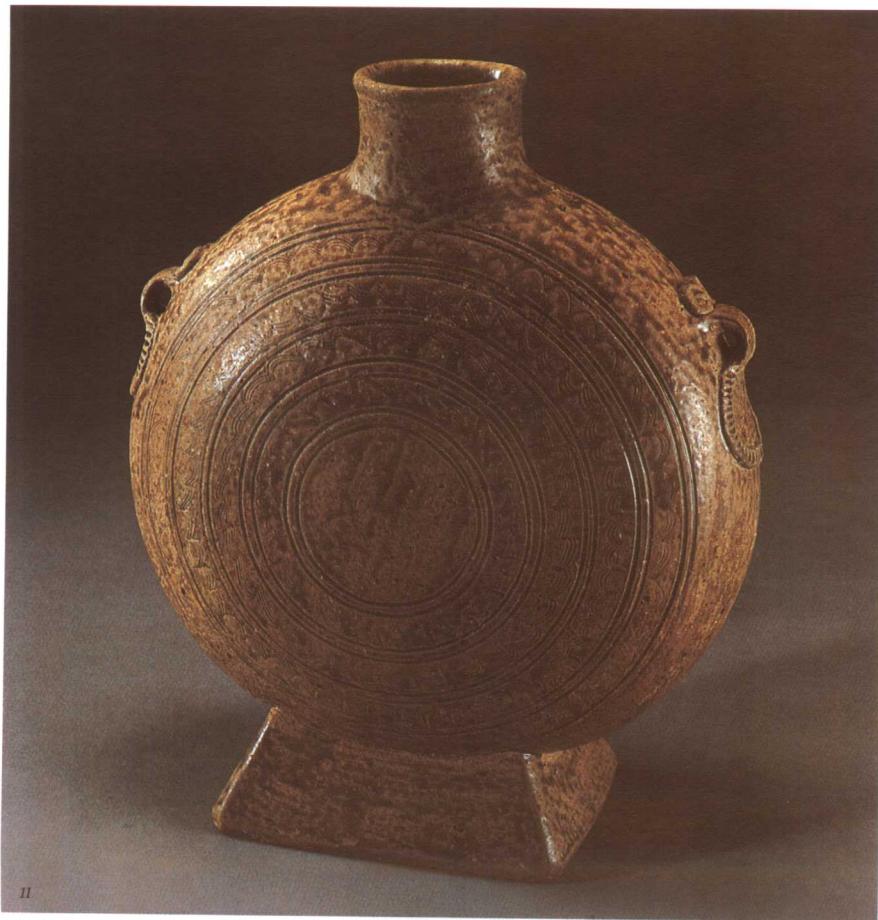
1964年河南洛阳市庞家沟出土。洛阳市文物工作队藏。





10

方瓷器在造型、工艺等方面都明显受南方青瓷影响，但由于瓷土的不同，胎质与南方相比差异较大，胎质粗硬，火度很高。釉色多在青绿中微微泛黄，釉层透明，光泽很强，釉面常有细碎的开片纹。北方瓷器在造型上有很强大的地方特点，器物胎体厚重，线条简洁明快，与北方粗犷豪放的艺术风格十分吻合。北方瓷器在成型、焙烧等工艺方面相对较粗糙，这些都表明北方瓷器的生产此时尚处在初级阶段。尽管如此，出土的北方瓷器中仍不乏精美的艺术珍品，其中河北景县封氏墓群出土的青釉覆仰莲花尊是最具代表性的作品(图14)。覆仰莲



11

10—青釉截点纹原始瓷罐

春秋。高12.0厘米。

江苏武进县淹城出土。常州市博物馆藏。

11—青釉划水波纹扁壶

东汉。高28.5厘米。

1986年浙江余杭县反山出土。余杭县文物管理委

员会藏。